学术动态

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条主要经验——实事求是

祁龙威

从 1951 年全国隆重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掀起太平天国史研究高潮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开创太平天国史学的罗尔纲前辈等都已物故。其第二代研究者亦将先后老去。从有利于我国历史科学的成长出发，亟需共同讨论两个值得沉思的问题：(一) 为什么五十年太平天国史研究曾经枝繁叶茂盛极一时，而近期却呈现萧条？(二) 为什么自罗尔纲先生溘逝之后，当代再无硕大声宏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泰斗？从这里，我们应当及时总结经验，供后贤借鉴。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外激烈斗争的形势，呼唤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勃兴。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主要是占全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饱受封建地主压迫之苦；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又遭到国际强权的残酷侵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战争的胜利。为保卫和发展胜利果实，在国内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在国外进行以弱敌强的抗美援朝战争。就在这时，史学界风起云涌讴歌近世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斗志，体现了“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性。

在崭新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指引下，史学界的思想获得大解放，大家冲破“粤逆”、“发匪”等的禁区，勇于重新解释太平天国史。其代表作为《人民日报》在 1951 年 1 月 11 日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而发表的社论。文章充分肯定这次农民运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歌颂太平天国将士爱国主义的英雄业绩，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乃是由于“内讧”和外国干涉。社论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反映了农民反封建的土地要求，但由于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所以他们的理想实际是空想。这些论断，大体上阐明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科学论点，并为我们建设和保卫新中国提供了借鉴。

当时，中国史学会倡议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第二种《太平天国》最先于 1952 年 7 月起，由神州国光社陆续出版，共八册。内容分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对不同的版本，专家作了校勘。对有些译文，经原译者作了修订。是书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还有一些新史料的发现和出版。

研究中总是有分歧，往往通过自由争论，求同存异。最突出的事例是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讨论。在史料考证上，则有对曾国藩家藏《李秀成亲供》真伪的分辨等。

[收稿日期] 2001—03—10
[作者简介] 祁龙威（1922- ），男，扬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 225002

综上所述，由于时代的需要，也就是广大人民的真正需要，加上作者的思想解放、资料易得、学术民主等有利因素，一时论著如林，人才辈出，形成了在学术史上罕见的太平天国史研究高潮。

不幸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上半期，我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文化科学濒临毁灭。由于这场浩劫是从人们比较熟悉的太平天国史领域打开缺口的，因而对太平天国史及其研究者制造的祸害特别严重。1965年所发动的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把一个学术观点问题无限上纲为政治立场问题。对罗尔纲等太平国史研究者进行了残酷的“围剿”。1974年，又险恶地发动“批孔”，批杨秀清“尊孔”。不久，人们明白，这些都是为陷害一大批共和国元勋而推行的影射史学。因为“文革”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经过这一噩梦，使“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方向和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都被蒙上阴影。“文革”虽然十年即告“永终”，然而它的严重后遗症——“信仰危机”，却对共和国的历史科学，尤其是太平天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但是，由于时势的推动和学术的内在规律所需求，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高潮还得继续。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拨乱反正”，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于是知识界又一次获得思想大解放。一大批有造诣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从消沉中重新活跃起来，继续研究一些重要课题，使之产生结果。当之无愧为一代巨著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即杀青于此时。其他成果累累，诸如茅家琦合江苏内行之力，纂成《太平天国通史》；郭毅生联全国群贤撰《太平天国大词典》及《地图集》；王庆成编《太平天国学刊》；钟文典编《太平天国史丛书》，可谓并驱竞走，各建殊功。对太平天国史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研究专书问世。若吴良祚之《避讳研究》、张守常之《北伐史》等，皆属功力深厚采山之作。略举数例，用以表明，我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继续出现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高潮。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太平天国史研究业已相对成熟。从立场观点来说，《人民日报》1951年1月11日社论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性质等所确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调，已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是推不倒的。从史料考证来说，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天朝田亩制度》的均产并耕方案没有实施；曾氏家藏《李秀成亲供》是真迹；《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伪书，等等，都已铸成了铁案。嗣后，如果没有新的重大的发现，如同王庆成从海外携归《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之类，就很难在太平天国史的纵深处继续获得耸动人心的进展。加以时局变异，人民群众古为今用的兴会也随之变异。于是在靡然从风、畸形发展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相对寂寥，这是不足为怪并不必为之怅惘的。

然而，由于这门学科尚未臻完美无缺，还得更艰辛地继续。怎样继续？我们必先吸取前人特别是罗先生成功的主要经验，即在占有史料上坚持实事求是达到博大精深的地步。但这已非现存第二代人所能冀及，惟有属望于后贤。

（二）

世无异论，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是开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人物。萧、郭、简都终于海外，我不及见。十余年前在北京，尝侍罗先生从容论三贤功力，罗先生独右郭氏。我以为至当。盖郭氏撰《史事日志》，搜书之多、排比之勤、考核之精，确非萧、简二氏所能及。至于罗先生，则因后半生的有利环境及惊人毅力，遂能在“占有史料”的火候上，远胜其侪辈。

“占有史料”的优良方法是学术界传统的考证学。尽管考证学不能解决立场观点问题，但它却为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国历代的史学名家司马迁、司马光……都是考证的高手。清乾嘉时代，考证之学大盛，以之治史学的杰出代表推钱大昕，可惜他虽有志重撰元史，但未竟其业。近世王国维、胡适、陈垣、顾颉刚等受西方实证论影响，再后郭沫若、范文澜等接受唯物史观，一次又一次地把考证学推进到新阶段，可惜他们也都未能独力撰成专史。罗

先生毕生以考证治太平天国史，不断随着潮流而前进，他上承乾嘉余绪，早年师事实证派巨子胡适，后半生学习唯物史观，最终撰成《太平天国史》巨著。以故他不仅是当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顶峰，而且也是凌驾前人的考证学大师。我们就是要继承和发掘罗先生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发展考证学的珍贵经验。否则这门学科的继续前进就难以实现。

从实践经验得知，史料考证有如下过程：第一，搜集，力求完备；第二，比较，包括辨伪、考异、校勘等，力求精审；第三，归纳，包括对书证、物证、人证的钩稽、排比和联缀，力求确实。这三者有时交错进行，不可截然分割。在这三方面，罗先生都达到了博大精深的地步。

第一，创造了搜集太平天国史料的途径。

众所周知，罗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搜集到了一千二百万字太平天国史料。这是郭廷以等所未能做到的。罗先生在《太平天国资料采编•序言》里写道："这一千二百万字是怎样得来的呢？计有三条途径：一、向全国各地广泛征集；二、到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搜访；三、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龙蟠里两个书库和前苏南区文物保管委员会书库发掘，而以第三条途径为主要来源。"这里，创造了文化史上所罕见的对公家库藏图书摸底。清乾隆时，为编《四库全书》，馆臣们从翰林院残存的九千多册《永乐大典》中辑佚，算是一次大规模图书摸底。当代，罗先生及其助手们在南京，为搜集太平天国史料，进行了又一次的库藏图书摸底。

南京图书馆的库藏丰富。1954 年时，它的颐和路书库藏书共有七十万册。罗先生率同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按库、按架、按排、一册一册地、一页一页地寻找太平天国史料，历时 9 个多月，计搜得有关书籍合共一千六百六十一种，包括稿本和抄本六十种。

罗先生从以上三条途径搜集到的一千二百万字中精选出一百八十万字，1961 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即为士林所称颂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此外，他还继承和发展萧一山等对太平天国文献的搜集成果，编辑出版《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晚年又编《太平天国文献六种》。

综上大略，足够表明，在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方面，罗先生的功力，已达到了博大精深的地步。

第二，严格比较太平天国史料的真与伪、正确与错误。

对于搜集到的太平天国史料，必须比较其真伪，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等都曾从事于此，但都比不上罗先生的全面和深入。这里举铸定两宗著名铁案为例：

(1) 鉴定湘乡曾氏家藏《李秀成亲供》是真迹。

按 1864 年湘军攻陷天京，艰苦撑持后期残局的太平军统帅李秀成被俘，他于囚笼中写下了长篇"供词"，历叙天国史事。曾国藩亲笔删改后，于安庆刻本流传，其真迹则一直深秘在湘乡曾富厚堂。1944 年暮春，广西通志馆派秘书吕集义等至湘乡阅看此书并摄影十五帧，由是学术界始见曾氏家藏《李秀成亲供》部分照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人否定此件是李秀成手写之本。于是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罗尔纲氏，在法医的协助下，使用现代技术，对笔迹进行鉴定，确认此为李秀成的手稿无疑。先是，学术界已从庞际云所藏《忠王李秀成答词手卷》见到李秀成的手迹。当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令亲信幕僚李鸿裔、庞际云面讯了若干问题。《手卷》就是讯问的记录。其中有曾国藩写的问语；有李鸿裔、庞际云分别记的李秀成答语；有李秀成手书的二十八字："胡以　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据庞际云附记，是因李秀成语操土音不可辨，乃令执笔写来的。经法医检验笔迹的结果，湘乡曾氏所藏《李秀成亲供》与这二十八字是出一人之手，由此确证《亲供》是李秀成的真迹。

(2) 揭露《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伪书。

伪造的太平天国史料不少，学者必须加以揭露，杜绝以假乱真。罗先生著《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作出了巨大贡献。

《辨伪集》的首篇即《〈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

《江南春梦庵笔记》迹署名"武昌沈懋良

撰”。书后有春草吟庐主人跋云：“懋良陷贼十三年，相处者又倡乱之巨逆，宜乎其所言源源本本，如数家珍也。”又说：“所载群逆之出处，伪制之详明，又是补诸书所未备”。此言这书提供了一批它书所缺载的太平天国内部史料。书中曾明白交代，与作者相处十三年，谈论大量天国历史的“倡乱之巨逆”，乃是赞王蒙得恩。如述洪杨的离奇来历时声明：“上皆蒙得恩所言。”是书初见于清光绪元年（1875）上海《申报》馆铅印的《四溟琐记》。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等纷纷征引。著名史家朱希祖曾在萧一山辑《〈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序》中称誉之为“所载事迹，则多正确”。其后竟被翻印入神州国光社本《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9册，使谬种流传更广。正如罗先生所说：“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太平天国法律与印行的书籍，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天朝田亩制度、省制等……即使遇到文献具在，记载分明、千真万确的史事，而因为它独有不同的异说，也居然根据它来怀疑真实的历史。”可见这书的以伪乱真，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罗先生师法清儒辨伪的经验，先用已经确定为真实的文献与《江南春梦庵笔记》相比较，揭露大量破绽，特别是从史料来源和内容之间的矛盾上，找到铁证，判定这是一部伪书，罗先生发现那个自称在蒙得恩身边十三年的沈懋良，对蒙得恩的生平却是无知。例如，蒙得恩明明有子时雍称“赞嗣君”，而《江南春梦庵笔记》却胡诌蒙得恩生三女，无子。又如，蒙得恩明明于辛酉十一年已经病死，而《江南春梦庵笔记》却虚构甲子十四年蒙得恩还在天王宫值宿，岂非见鬼！由此可见，沈懋良绝非蒙得恩的心腹，而他所公布的离奇史料也决非蒙得恩所言。由此可见，此书出于伪托。

由于《李秀成亲供》与《江南春梦庵笔记》的内容都全面涉及太平天国一朝史事，如果不判定前者是真、后者是伪，那么，众多学者对一部太平天国史的了解，就将一直陷入混乱之中。以故罗先生对以上两宗铁案的铸成，其考证之功，博大精深是不可磨灭的。

至于罗先生师法司马光《通鉴考异》、朱熹《韩文考异》，对太平天国史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不同版本，比较确定其正确与错误，则其事甚多，这里不再举例。

第三，详尽钩稽和归纳专题史料，弄清太平天国事实。

兹举《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对“冲天炮”的一条注释为例，以显示罗先生归纳史料的工夫何等深厚！按李秀成说：“十一年正月初，由常山动身，上玉山广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扎，攻打二十余日未下，外有清军来救，则冲天炮李金　带兵。”其后又说：“先有冲天炮李金　带有清兵十余营屯扎阴冈岭，与我部将谭绍光、蔡元隆、郜永宽等迎战，两军对阵，李金　兵败，其将概已被擒，全军失散，拿其到步……过了数日，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后闻被杀。”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误会李金　是太平军叛徒，对其来历不详。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盲从《郭志》，以误传误。罗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的一、二、三版，都未注释李金　为何许人。四版即“增订本”始据欧阳兆熊《水窗春呓》，注：“冲天炮是李金　的绰号。”还不能说明问题，嗣后，罗先生陆续钩稽和归纳有关资料，在1982年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里，才原原本本地交代了其人其事。

> 李金　，清朝副将（据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廿六日江西巡抚毓科奏），绰号冲天炮，勇悍绝伦（据欧阳兆熊《水窗春呓》卷上）。左宗棠戊午派李金　带勇至蒋益澧军中，他在“李守备金　”句下注说：“即冲天炮也。有血性，善冲锋，熟悉楚粤边界情形，故遣其来。此子要善驾驭，以之冲锋恐太轻，以之打接则无不胜矣”（见《左文襄公书牍》卷四《答蒋芗泉》）。所以李秀成说他“是勇将有名之人”。李金　本是天地会员，在湖南起义，称统领元帅，后来叛变投降清朝（据王　清咸丰五年三月初六日《永明剿贼大捷夺获富川县印信并各件请赍送广西省核收禀》，见《王壮武公遗集》卷三《禀牍》三）。阴冈岭战败被俘，李秀成释放他，走归江西省城自首。时狱未定，左宗棠《致曾国藩信》说：“江西于李金　事，似颇难处。弟意欲其解送敝军了之，以除一患。此辈不用则杀，别无处置也”（原件南京图书

> 馆藏)。后来江西巡抚毓科把李金 解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就借失律把他处斩(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李金 张光照正法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据欧阳兆熊说李金 被斩未死，后逃为和尚(见《水窗春呓》卷上)。又按李秀成擒李金 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卅一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据曾国藩《李金 张光照正法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这是李秀成未入湖北克瑞州府前四天的事。此处乃补前事。

在罗先生的著作中，类此归纳史料之例，多不胜举。就是这样，他如聚沙成山，汇流归海，一点一滴地把太平天国的史事，基本上弄清楚了。其博大精深，实属当代一人。

我尝窃论，并世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诸君，各有成业，但总不能比罗先生之博大精深。在史料考证上，若语其一曲，智多过之，但览其全局，则均不能攀其项背。其故安在？一言以蔽之，功力不足也。

(三)

昔年我曾作《罗先生赞》，谓其所以博大精深，是由于锲而不舍、从善如流，几十年如一日，才能结此硕果。现在必须补充，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即罗先生终身信奉乾嘉考据学“实事求是”的准则。这是他成功的主要经验。

考证重在证据。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强调说：“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之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判狱，责任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他要求“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于本题的相干性”(台北《文星丛刊》106号)。只有证据确凿，才能成为定论。罗先生的大量考证成果，都是言必有据，经得起驳问的。他根据《忠王李秀成答词手卷》鉴定湘乡曾氏家藏《李秀成亲供》是真迹，即典型的一例。罗先生所引为铁证的李秀成书二十八字，是真实的。他用以鉴定《李秀成亲供》笔迹，是紧扣的。又如罗先生根据《蒙时雍家书》等太平天国文书，揭露《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伪书，也是无可辩驳的，所刊佐证都是真实和紧扣本题的。

考证重证据，绝对不能想当然。《光明日报》副刊第八十八期登载《柬埔寨与我国友好联系》一文，把柬埔寨与我国交往从三国提到了前汉，照寻常说法早了几百年。其论据是引《梁书•海南诸国传》等，有“海南诸国自汉武以来皆朝贡”等语，就断定“柬埔寨和我国在地理上那样靠近，当时也必定已经发生关系”云云。陈垣在《柬埔寨始通中国问题》一文中严肃批评说：“这样断定，颇与昆曲《十五贯》过于执县令的审判方法相类，过县令说：‘看她艳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就判定苏戌娟和熊友兰一定有奸情了。这类判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卷)。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在罗先生的不朽之作中，尚有个别以“想当然”取代考证之例。其中最有影响的，即“李秀成伪降”说。

按李秀成在囚笼中向曾国藩乞降，有白纸黑字的《亲供》为证。此本无可置疑。但罗先生是一位热爱太平天国的学者，他总不愿见到李秀成的晚节不终，因而天真地设想，这是李秀成熟读了《三国演义》，因而学姜维伪降魏将钟会，伺机策动钟会反魏，以图复汉的故事，志在复兴太平天国。罗先生作此推测并写进论文，是可以的。但因为没有真实和紧扣本题的证据，就不能成为考证的结论。早经学术界反复搜索，所谓“李秀成伪降”说，是言之无据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为反对“文革”搞影射史学，别有用心地批判李秀成“晚节不终”；转而重申虚构的“伪降”说。这是背弃了“实事求是”的准则。然而对此学术问题，仍容许继续深究。

1977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有一位名叫俞大缜的退休女教授，辗转向罗先生提供了关于李秀成劝曾国藩称帝的传说：

> 我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我的外祖父名曾纪鸿，是他的次子。精通数学，死得早。我的母亲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当时的两江总督衙

门内。听说在她出世前不久曾国藩已死去。抗战期间，我一直在重庆沙坪坝旧中央大学外文系教英文。胜利后，于1946年秋，离开重庆，到北大西语系来任教，路过南京，探望母亲。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伪），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提到天王府，就提到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的《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所写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悟[顿]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

1981年3月2日，《广西日报》发表了罗先生的文章《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其中郑重声明："确实不错，这一条曾国藩家人自己说的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的证实李秀成学《三国》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其后，罗先生把这些材料作为《李秀成李容发传》后的"本传考证"，刊入199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第五十七卷中。在罗先生健在时，学术界未及再讨论此事。

1997年5月，罗先生溘逝。海内外同仁纷纷撰文追悼，以纪念此一代宗师。在1998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的《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里，茅家琦兄特别提到《广西日报》公布这一条曾氏家人口碑之事，赞美罗先生能在"文革"惊涛骇浪之后，"坚持真理，顶住巨大压力，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2000年，朝华出版社出版的《学林往事》，辑入郭毅生兄的《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其中有"孤怀宏识，为李秀成辩诬"一节说："罗先生本着纯洁的学术道德和坚持真理的精神，重新发表了《李秀成伪降考》，又将自己研究结论和材料写入本书卷57的李秀成传中。""他又在后边的'本传考证'中引述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提供的重要口碑材料，证明李秀成确系伪降。"这些文章正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敢附诸兄之后，对"李秀成伪降"说作进一步探究。曾氏后人那一条口碑，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用以证明李秀成劝曾国藩做皇帝。若径以之作为李秀成伪降以图复国的铁证，则仍属想当然。至于俞教授"顿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则是她自言读了罗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的"伪降"说而联想的结果。由此可见，我们在追怀罗先生史德的同时，尚需为其所提出的"李秀成伪降"说继续查据。此事涉及历史考证的方法问题。

四十多年来，我私淑罗先生以考证治太平天国史。在占有史料上功力单薄，深愧无成，补牢已晚。但垂耄不敢背离罗先生教我的乾嘉考证学的准则——实事求是。我之所以颂赞罗先生鉴定《李秀成亲供》是真迹、揭露《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伪书等的丰功伟绩者原因在此；所以不敢苟同《李秀成伪降考》者也在此。相信年轻一代同行必能继承和发扬罗先生的这条成功的主要经验，即在史料考证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准则，以便达到博大精深，把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新世纪，开创新局面。